

中国文学年鉴

ALMANAC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5

中国文学年鉴社

中国文学年鉴

2005

中国文学年鉴社

《中国文学年鉴》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杨 义

副主编：白 烨 陶国斌（常务）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中忱	王烈耀	叶舒宪	白 烨	包明德
刘扬忠	刘跃进	吕 微	李伊白	李继凯
杨 义	吴秉杰	陈 飞	陈 洪	陈晓明
张 强	张中良	孟繁华	赵存茂	胡 明
高建平	党圣元	陶文鹏	陶国斌	曹顺庆
温儒敏	朝戈金	雷 达	黎湘萍	

《中国文学年鉴》编辑部人员

主 任：赵存茂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晓平	牛松丽	严 平
邱 建	陈定家	周永琴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协办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编辑出版者：中国文学年鉴社

国内统一刊号：CN11-4096/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代号：ISSN 1672-0814

地 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传真：(010) 85195621

E-mail: nj-wx@cass.org.cn

印刷者：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年8月

目 录

现状考察

当代文学审美趋向辨析·····	雷 达 (3)
在适应中坚守	
——文坛现状的观察与思考·····	白 烨 (11)
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和结构转型·····	张 柠 (16)
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	吴思敬 (24)
“80 后写作”现象观察·····	杨 展 (27)
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	李敬泽 (30)

作品选载

· 长篇小说 ·

狼图腾 (节选)·····	姜 戎 (35)
英格力士 (故事梗概)·····	王 刚 (42)
人面桃花 (故事梗概)·····	格 非 (46)

· 中篇小说 ·

马嘶岭血案·····	陈应松 (49)
不能掉头·····	映 川 (70)
喊 山·····	葛水平 (88)

· 短篇小说 ·

那 儿·····	曹征路 (106)
大 年·····	郭文斌 (126)
小嘴不停·····	铁 凝 (136)
白水青菜·····	潘向黎 (140)

· 散文· 随笔 ·

悲情的思想者·····	王 蒙 (146)
1976 年·····	路 也 (150)
原下的日子·····	陈忠实 (154)
减 法·····	格 致 (157)
臭臭,我想你·····	春 儿 (163)

· 报告文学 ·

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关于和平岁月死难烈士家人们的报告 (节选)·····	罗 盘 (167)
---------------------------------------	-----------

窃心大盗——青少年网恋调查	祁 建 (179)
欲说还羞性教育	曲 兰 (197)
· 诗歌 ·	
兰	黑大春 (222)
孔 子	清 平 (223)
巨 兽	西 川 (224)
根	洛 夫 (225)
作为诗人	黄灿然 (226)

研究综述

文学理论研究综述	刘方喜 (229)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	马银琴 (235)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陈 君 (247)
唐宋文学研究综述	陈才智 (255)
元明清文学研究综述	刘 倩 (271)
近代文学研究综述	王达敏 (282)
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杨联芬 (288)
当代文学研究综述	杨 早 (300)
台湾文学研究综述	李 晨 (309)
港澳文学研究综述	李 晨 (319)
民间文艺学研究综述	曹 荣 (328)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刘亚虎 尹虎彬 汤晓青 刘大先 (347)

论文摘要

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	南 帆 (363)
文学人类学：历史·概念·语境·方法	
——文艺与人类学的相互碰撞与整合共生	李凤亮 (364)
美学研究审美价值的消费和评价	杜书瀛 (365)
审美文化·视觉文化的转向	周 宪 (366)
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	
——“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	金惠敏 (367)
在消费文化面前文艺学何为？	李春青 (368)
艺术与生活：多远？多近？	
——审美—艺术观念流变考察	张婷婷 (369)
超文性戏仿文体解读	赵宪章 (370)
现代文艺学几个关键词的翻译和接受	高建平 (371)
“文学理论学”构建刍议	董学文 (372)

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	金元浦 (373)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陶东风 (374)
文化研究的得失与文学理论的知识重建	汪正龙 (376)
周代礼乐制度下诗歌的传授系统	马银琴 (377)
汉代歌诗艺术生产的基本特征	赵敏俐 (378)
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	跃进 (380)
《〈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	章培恒 (381)
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刘跃进 (382)
论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	李剑锋 (383)
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	张伯伟 (384)
元和体名义辨析	陈才智 (385)
《容安馆札记》论宋诗初学记	王水照 (385)
宋金“十大曲(乐)”笺说	张鸣 (387)
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	陈大康 (389)
试说嘉庆、道光年间的“花谱”热	么书仪 (390)
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	[美] 孙康宜 (391)
民初上海文学“甲寅中兴”考索	陈方竞 (392)
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小说	郭延礼 (393)
“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	王富仁 (393)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黄修己 (394)
回到经典 重释经典	
——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	黄曼君 (395)
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	黄万华 (396)
大陆文学史上的梁实秋身份问题	张中良 (397)
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	李怡 (399)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问题	杨匡汉 (400)
九十年代与今天:文学的命运	张颐武 (401)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及东亚现当代文学的文化选择	吴秀明 郭剑敏 (402)
日据末期《风月报》新旧文学论争述评	
——关于“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战	朱双一 (402)
殖民地处境与日据台湾新文学	计璧瑞 (404)

论著评介

《文学理论:文化阐释与学科形态》	张永刚 (407)
《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	黄鸣奋 (408)
《网络文学本体论》	欧阳友权 (409)
《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观照》	邓新华 (410)
《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广义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文本形态》	蒋荣昌 (411)

《象征的灵境》	陈太胜 (412)
《中国商贾小说史》	邱绍雄 (413)
《比较与超越——世纪之交中西文论比较研究》	张艺声 王建华 (414)
《汉初士风与汉初文学》	程世和 (415)
《汉赋史略新证》	朱晓海 (416)
《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	曹道衡 (418)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李士彪 (419)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	梅家玲 (420)
《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	王晓骊 (421)
《唐诗学史稿》	陈伯海主编 (421)
《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	张永利 (422)
《徘徊于七宝楼台：吴文英词研究》	田玉琪 (423)
《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	宋莉华 (424)
《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	马瑞芳 (425)
《近代经学与文学》	刘再华 (426)
《文学革命的先驱黄遵宪新论》	张永芳 (427)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	金宏宇 (428)
《非文学的世纪：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朱晓进 杨洪承等 (429)
《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中国现代随笔研究》	黄科安 (430)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刘淑玲 (431)
《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	阎庆生 (432)
《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	朱立立 (433)

学术会议

文学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	(437)
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	(437)
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	(438)
网络文学与数字文化学术研讨会	(439)
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	(440)
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全国研讨会	(441)
邓小平文艺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讨会	(442)
全国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	(443)
“传统文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	(444)
文学史理论创新与建构暨《20 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研讨会	(445)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应对策略学术研讨会	(446)
“本体意识与世界视野——重建中国文学史理论体系”学术研讨会	(447)
东亚中国传统文化暨越文化学术研讨会	(448)
《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	(448)

辛弃疾学术研讨会	(450)
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第二届年会	(452)
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近代化学术研讨会	(454)
中国唐宋诗词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454)
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	(455)
中国中古文学(汉-唐)国际学术研讨会	(457)
《文学遗产》西部论坛	(459)
第六届两岸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	(460)
中国中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461)
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	(462)
第五届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	(464)
2004 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届年会	(465)
2004 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	(466)
2004 年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466)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 12 届年会暨国际唐代文学研讨会	(467)
第三届中国辽金文学学术研讨会	(468)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	(469)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470)
鲁迅研究 20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47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47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讨会	(473)
王鲁彦作品研讨会	(473)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研讨会	(474)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	(475)
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	(476)

文坛史料

我记得的路翎

——为他逝世十周年而写 绿 原 (481)

大事记

2004 年文坛大事记 白 烨 何 鹏 (491)

资料辑要

第二届老舍散文奖在京颁奖 (507)

2003 年度小说排行榜 (507)

第三届“春天文学奖”在京颁奖	(508)
“中坤杯·首届艾青诗歌奖”在京颁奖	(509)
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	(510)
金庸获颁法国骑士勋章	(510)
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2001-2003)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	(511)
《青年文学》颁发“慈溪农行杯”文学大奖	(512)
“中国首届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在海口颁奖	(512)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揭晓	(514)
2004年“长篇小说年度奖”北京开奖	(516)
年度辞世文艺家	(517)

当代艺文志

南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525)
汕头大学文学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	(526)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528)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	(529)
中南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	(530)
南昌大学中文系	(531)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532)
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533)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戏曲学研究中心	(533)
天津理工大学美国华裔研究所	(534)
阜阳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534)
编后语	(535)

现状考察

当代文学审美趋向辨析

雷 达

近年来，在创作上呈现出几条大的审美走向，它们往往与文学功能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的起伏相联系。从现象上看，它最先从题材层面上反映出来，但根子却在审美意识的取向上，对此有必要加以梳理和审视。

最大的变化在于文学重心的转移

“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对农业文明传统深固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 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其改变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们知道，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对农民问题讲得最多，最透彻，中国革命被称为农民革命，中国文学里写得最充分的也是农村和农民的形象。五四“文学革命”曾以启蒙精神揭示沉默国民的灵魂，往后的“革命文学”，则大力描绘农村革命史诗，以至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为之留下了大笔财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文学这样与乡土有着如此深刻的不解之缘。但事情已经发生变化，新世纪以来尤甚。如果说 80 年代的文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精神影响力上依然是以农村为重头戏的话，那么 90 年代中期以来，传统乡村和农民的形象日渐淡出，不但失却原先的精神根基，而且多以城市价值的附庸者出现。我们甚至惊讶地发现，一种似乎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正在成熟。闹市与商海，警匪与反贪，时尚与另类，女性与言情，知识

者与打工者，其命运戏剧正在取代昔日农村和农民的显要位置，成为文学画图的中心。何以会如此？有人说，这是因为中等收入族完全没有了乡村经验，因为大城市的自足性使很多人可以彻底切断与乡村的联系了。有人认为，未来代表汉语言文学发展水平的，不再是乡土文学，必将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写出了现代中国都市人精神处境的作家；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中国不是没有“中产阶级”和后现代问题，但并没有估计得那么重要，忽视和遮蔽了农民问题的巨大存在，才是严重的缺失，倘若不能写出转型时代的农民之魂，我们的文学将从根本上丧失力量。的确，“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境况和精神诉求似乎越来越不在文学视野之中，不少文学人士热衷谈论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仿佛中国问题只剩下后现代问题了。事情当然不是如此。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发展和变化，它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密切联系，它蕴含着现代人亟需的精神元素，必然要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底层意识等方面延伸。在《大漠祭》《日光流年》《歇马山庄》《好大一对羊》等作品里可以看到，作家们在发挥写实主义的感染力的同时，努力超越题材表层时空意义，走向整体象征。但类似的作品未免太少了。现在，文学界强调“三农”问题重要，呼吁文学应该大力描写“农村题材”的声音日高，但大多停留在号召上。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还是用熟知的一套观念

写农村农民，找不到新的语境下与当代生活、当代读者的精神连结点，找不到市场需求的敏感点，那是怎么呼吁也没有用的。

“欲望化描写”与道德理想 的关系构成了当今审美意识 中非常突出的矛盾

这里不是指哪一种题材，而是渗透于几乎所有题材中。人的欲望固然从来都有，但在今天，也许由于利润法则的刺激，也许由于商品化、实惠哲学带来物质对精神的覆盖，总之人的世俗欲望空前地放大了，突出了，无形中成为文学描写的重点。在大量作品中，围绕各种欲望展开的矛盾错综复杂，光怪陆离。权欲，钱欲，情欲，占有欲，支配欲，暴发欲，破坏欲等等，成了很多作品中最习见的场景。于是有人将之称为“欲望化写作”，有人干脆自称是“欲望现实主义”。这是以往的中国文学中从来没有过的密集图景。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也是某种生活真实的反映。例如，我们习惯于笼统地批评文学中的性描写和物欲追逐，而很少注意，作为文化符码，洗脚屋，桑拿房，壮阳药，美容院，以及名车，豪宅，美女，股市，彩票的广告，几乎无所不在地环绕着人们。既然如此，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写了欲望，而在于怎么写。

以“欲望化描写”为核心的选材倾向直接导致了官场小说、犯罪小说、都市时尚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的盛行。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不少作品热衷于感官化、刺激性、消费性的展示，逗留在现象层深入不下去，既不能深刻分析人物的心灵冲突、精神矛盾，也不能以理想之光照耀形象世界，使之升华出新鲜的诗意。像王安忆的《长恨歌》这样意蕴深藏的都市文本毕竟不多。比如，这种欲望化倾向表现于某些官场小说，是辞气浮露地渲染贪欲、腐败，孤立地而非整体性地表现“反腐”，路子越来越窄，概括力越来越

弱。这种倾向表现于某些都市小说，是商业化影响下的浓厚的大众文化趣味，突出展现物欲渴求和感官体验。这被称为时尚化文学，它的土壤是发达的时尚文化，感官化是其主要表征。这种倾向表现于某些女性主义小说，是注重私密体验，解构启蒙话语，强调女性在社会体验，身体经验，文化构成，心理特征上，皆有别于男性，因而大力肯定女性的生理独特性及其人文诉求，表现她们在与男权、男性的冲突中自我实现的要求和寻求平等的呼声。不可否认，性是这类创作的敏感点，中心点，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往往是从这里入手的。这当然无可厚非，其打破传统观念的意义也在一定意义上应予肯定。然而，也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作品有意割弃与广阔社会生活的联系，剔除人物身上必不可少的社会性活动和道德激情，固守在私密的天地里，致使其文化内涵稀薄。它们超越人文话语进入了性别话语，要真正深刻起来是否应该再超越性别话语，回到人文话语？另一方面，过分依赖感官和本能，放弃对多重人生价值的参照和探索，使这种“个人化”日渐“干涸化”，生发不出崭新的意义，整体上缺乏足够的精神维度。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不少作品不能令人满意，根源在于，精神建构和情感升华不足，没有高远的道德理想汲引，没有对人性的深刻分析，没有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大力肯定。这里，“身体写作”也许是个关键词。有的论者强调，身体是写作的起点，作品的思想，意蕴，语言，无不带有作者身体的温度，他们批评不“从身体出发”的写作是“面具写作”。他们说，如果传统作家注重的是“精神”，那么新生代作家注重的是“身体”，而“身体”不可避免地欲望联系在一起。就尊重个体反对禁锢而言，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文学的根本审美特性是精神性的，“身体”与“写作”之间，最不可缺少的中介仍是灵魂和精神，与

其推崇“身体写作”，不如鼓励“灵魂写作”。因为精神的缺席，才有了从“身体写作”滑向“下半身写作”的恶谑一途。

世俗化与崇高感的矛盾， 也是贯穿在当今文学审美 意识中的另一个突出问题

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把人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扬弃假大空和伪崇高，无疑是一大进步。于是，知足常乐，健康长寿，满足于平安与舒适，注重眼前物质利益，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虚幻意义，已成为当今最重要的生活价值目标。这种价值观影响到文学，便是近20年大幅度向真实生活的回归，向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生存的回归，向写实主义的回归。“新写实”潮流的大行其道，例如池莉的新市民小说的大受青睐，“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兴衰，“朴素现实主义”的流行，均与此不无关系。比如池莉的受欢迎就值得研究。有人称她的语言是“唠叨文体”，这种“唠叨”可能正是新兴市民阶层日益庞大，其生活化、实惠化的话语现实，是市民心态和趣味的对应物。

这些世俗化思潮无疑产生过许多受欢迎的作品，但是，作为一种持续不变日渐凝固化的文学状态，未免显出了疲惫之态。其中与文学的崇高感、理想精神的不足以及英雄文化的疲软，所造成的明显空缺，大有关系。因为，人类总不会满足于平庸。崇高感的鼓舞，英雄文化的豪情，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神往的，何况全民族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型时代，肯定需要开拓精神的激扬。但是，我觉得，在扬弃了伪崇高和伪浪漫之后，我们的文学似乎一直难以摆脱价值迷茫的困扰。没有现实的英雄偶像，人们只好到古代传奇、新武侠小说、好莱坞大片中寻找替身，寻找满足，这当然也是需要的，但终非长远之计。从《英雄无语》《解密》

《西去的骑手》等一些尚能发出审美异调的作品的受到注意，从《三国》《水浒》《长征》《英雄》等影视片的热播，不难感应此种消息。“一地鸡毛”式的仿真写法开始让读者不耐烦了，但要写出现实的、感人的崇高精神的篇章，难度依然很大。有人举为一种成功秘诀介绍说，写现实要写普通人，写古代要写英雄，把写现实中的崇高视为畏途。看来，当代文学要发挥出阳刚的一面，变得充满憧憬，激荡人心，必须致力于对日常化、世俗化生活流程中潜在的崇高精神的挖掘，致力于对当代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发现和重塑。

解构历史、消费历史与历史 理性精神的矛盾，是当今审 美意识中的又一重大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表现出强烈的重诉历史的欲望，这其实是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企图通过重新阐释历史来肯定现实中欲肯定的东西。总的看来，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成绩是主要的，突出的。对历史题材的处理经历了由当年的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到今天的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可说是个大转折，其中伴随着历史观的微妙变化，也与突出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密切相关。把圣君贤相纳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认其作用，显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然而，由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否定“帝王”，到现在的某些作品又走向另一极端：无条件地讴歌“帝王”，都是形而上学。有些作品在歌颂帝王时，把皇权思想，人治思想，专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儿很浓，把皇帝塑造得可亲可爱可敬，十分高大全，无形中在张扬一种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集权政治。连张艺谋的《英雄》也未能逃出这一思路。它们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实在脱节。当然，怎样做到在肯定圣君贤相时

把一些很难不夹带进来的消极思想剔除出去，无疑是创作上的大难题，需要深入辨析。随着市场价值介入历史题材领域，另一倾向也在左右创作：制作者们的兴趣集中到了争宠、夺嫡、篡权、谋位方面，形成了一套以权谋文化为中心的构思模式和叙事策略。他们表示，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老百姓喜欢”，不能说毫无根据。那么，老百姓究竟为什么喜欢？从深层来看，还是因为触到了官本位文化之根，古代官场让人联想到现实官场，官本位文化如臭豆腐，既让人厌恶，又让人艳羡。与此同时，是“戏说”的风靡一时——把历史作为消费对象，作为喜剧和闹剧的原料库，不断“搞笑”，不过是拿历史作由头而已。历史学家格外看重的“历史真实”被扔到爪哇国去了。应该看到，历史题材创作领域里所发生的种种，正剧也好，戏说也好，解构也好，翻案也好，都是市场经济时代和现代转型社会多元文化思潮的反应，带有某种必然性，即使某些戏说之作，若不是多到不可容忍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把历史涂改得面目全非，让青少年误读了中国历史，那问题就大了。显然，这一领域存在着纷纭缭乱的眼光，有的翻案文章作得太离谱，已背弃了基本的历史真实和被证明属于规律性的东西。我认为重要的是，当此五色杂陈之时，在主导方面体现出理性的历史精神就可以了。

作为当今审美意识的反映，在对红色经典和文学名著的改写改编中出现了所谓“人性化处理”问题

这已不是单个现象，而是趋之者若鹜，形成了一种时尚和风气。我以为，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对红色经典和某些名著重新解读甚至加以改写改编，并非不合理，不可能，或完全没有必要。任何一个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必会显现出不同的价值层面，因而产生新的精神需求，作为

一种再创造，如果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得当，能给出新的解释和新的造型，完全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审美境界。红色经典如《夏伯阳》《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改编，文学名著如《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哈姆雷特》之改编，都是例子，《悲惨世界》被改编了七次之多。

我国一些红色经典的被重新发现，改编者日众，至少说明，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仍具有某种生命力，它们并不是简单化地扣上一顶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的帽子，就可以打入冷宫的。艺术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主观与客观，世界观与创作，作家宣称的思想与作品实际的形象系统，错误的观念与充满血肉的人物，当时的美与现在的美，都有可能构成多重价值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耐人寻味的是，在今天，由于时过境迁，以描写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红色经典本来没有太多市场价值可言，可是，事物的两面性在于，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人物其实又是具有某种“潜价值资源”的，只是有待于发现。什么是“潜资源”？首先是，它们可以提供当代创作中匮乏的英雄情怀。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曾经家喻户晓，知名度极高，于是，英雄的个性化、性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并有可能成为新的卖点。这也许就是红色经典改编忽然成风的秘密所在吧。不可否认，它的背后有市场的影子。

根本问题在于，不少改编者把改编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看不到巨大的难度和对作家思想艺术准备的严苛要求。这种改编布满了难题，不亚于从事原创性作品。普遍的情形是理解上失之肤浅和简单化，以为注入一点小资情调，作一点翻案文章，颠覆一下原有的人物关系，来个大逆转，让高大降为平庸，坚贞变为放荡，刚强变成窝囊，就算完成了人性化处理，显然错了。有些改写者似乎并未意识到，许多“红色经典”包括样板

戏，乃是左翼审美文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积累和不断的总结经验的产物，有的甚至是一种“结晶体”，它有它失误和偏颇的地方，却也有它的精湛和深刻，决不能因为某个人曾经“插手”过某个作品，它就糟糕到不值一提，只配唾弃了事。事实上，人物处理上的得失只是表象，争论的实质牵涉到对革命传统、现代史和党史的评价问题，颇为复杂；而在艺术上，要胜出久经打磨的原著，难度同样也不小。所以，改编改写未必不可能，却需要足够的见识和功底，方有望成功。否则，不过是短期的市场行为和旋生旋灭的泡沫而已。

文学的版图是否正在缩小

当今的文学称得上数量浩繁，缤纷多样，加以各种“炒作”和“命名”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若仅从表象看，似乎可以用“多元化”来描述。然而，冷静思之，又会感到，这种“多元”胜景却不无虚浮成分，甚至遮蔽了某些重要方面的阙失。比如，在文学功能得以全方位展开的同时，是否存在一些功能膨胀了，一些功能萎缩了的情景？是否因之带来文学生态的严重不平衡，并导致了文学功能的弱化？事实上，放在当下的历史文化语境里，这个问题已变得分外突出，只是我们未加正视罢了。比如，我们是否缺少足够数量关注政治，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的大气魄、大手笔的文学作品，而这与我们的某种偏颇的认识是否有关？最近，读了一批作品，震动很大，它们促使我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同时思考什么是“文学本身”和“回到文学本身”，什么是文学的活力之源和创新之途？

比如，作家张平把他的小说《国家干部》直称为“政治小说”，周梅森也有类似提法，均不失为一种直率和勇敢。张平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所提的问题相当尖锐。

他说，文学对脚下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越来越疏远，除了用西方某些观念和书本知识对当今现实生搬硬套外，对底层劳苦大众并不真正熟悉，对正在发生的政治运作并不了解，对老百姓想些什么并不清楚。由于不了解政治，不了解社会，自然也就无法描写政治和社会，恶性循环，只能距离政治越来越远，距离社会越来越远。这种情况并非只在新生代作家中有，中老年作家中也同样存在。他还说，令人畏惧的是，总有一些人，一再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张平这番话，无形中提出了一个熟视无睹的大问题。对于当今的文学而言，没必要所有的人都去研究政治，直接描写政治，如果那样会很荒谬，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字倘若在整体上远离政治，基本放弃从政治的宽阔视角去解读社会人生，那将是一种可悲的偏废，那样的文学断难成大气候。

我们知道，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历史教训是异常深刻的，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扼杀个人声音的现象比较普遍，因而新时期开初，有识之士提出了“回复文学的本性”和“回到文学本身”的吁求，自有非凡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该彻底地脱离政治，与政治决裂，或者认为文学的目的只能是为了自我满足的需要，或只是自说自话的方式，与听众无关，无需承担任何使命。文学发生起点的个人感受性并不导致文学是与任何人无关的私密之事的结论。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文学本身”？有没有一种在历史运动中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宗教等等互动着的，却又被宣称为与它们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文学本身”？试想，把一切都剥离掉了，还能剩下什么？本能？食与性？事实上，剥到最后，连“文学本身”也就不存在了。不应忘记，文学终究属于意识形态，当然是审美意识形态。我们所讲的政治理应是一个大概念，应该更侧重于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既表征为

权力的中心，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同时，又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性力量的交汇要冲，政治意识总是历史地沉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起着深层的控制作用，作为社会的人很难脱离，作为表现社会的人的文学，同样很难脱离。我们对权力的层面往往比较敏感，对其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则往往忽略，在创作上，表现为故意回避和淡化，这无疑会损伤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大大削弱感染力。有些作品当然是可以远离政治的，但纯粹到一尘不染的，尚未有过。其实，所谓纯审美论，无利害说，纯“为艺术而艺术”，往往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然而，当今的文学似乎并未意识到其重要性，每每遇到解析历史，认识命运时，宁可用另外一套观念，例如爱，死亡，物竞天择等（这也许是同样需要的），也不愿从社会政治的通道进入生活并深化其开掘。这是一种放弃优势而不用自我束缚，不仅限制了文学题材领域的开阔，而且限制了文学眼光的开放程度，甚至牺牲了文学应有的一部分功能。这里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关系。比如，强调文学超国界，超种族，超语言，扩大人类普遍性的含量，与文学对本土的、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习俗现状的描绘（政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之间的关系。就某种意义来说，后者是基础，抽去这个基础，人类性和超越性往往落空。个人化声音的重要性也一样。个人声音的大小、强弱及震荡幅度，与其社会历史人生内涵的深浅和有无批判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指出，当前的文学在总体上对公众利益，公共事业缺乏足够的关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读者的回应热情，应该不是无的放矢。与之相联系的是底层意识的匮乏，对底层劳动者的隔膜，主要是对农民和农村生活表现的乏力，这些也都是形成文学版图缩小的原因。

然而，必须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

有文学家的政治，两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也没必要追求趋同。完全趋同就可能重返“工具论”的老路。文学家的政治不仅在于必须首先遵循文学的独特规律，而且在于，必须是通过对人的灵魂审视而达到对人的精神关照，它更多地侧重于政治与人的内在关系的角度。现在普遍的问题是，一些关注政治、贴近现实的作品，面临模式化、平面化的困扰，缺乏新的思想和新的形式，相当多的作品停留在“反腐”的水平上，停留在义愤上，停留在黑幕小说的趣味上，或就事论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写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过程，或仅仅把政治理解为权力的操作，难以站到时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整体性地把握生活和对政治文化的建构精神来统驭题材。在文学史上，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像雨果的《九三年》，司汤达的《红与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等等作品，它们都含有很强的政治性，毋宁说是在写政治，但那是何等睿智的眼光，超越了题材表层时空的有限意义。应该说，近年来文坛上以张平、周梅森、陆天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政治小说”是引人瞩目的，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作家的良知和正义感、使命感，无情揭露和鞭挞了腐败现象，向世人展现底层大多数人的生存境况，进而思考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的矛盾关系，既思索政治体制对改革的影响力，同时探索伟大的改革对现存政治体制的反作用力。然而，必须看到，他们的作品包含着较强的新闻因素，理论因素，以及某些报告文学元素，近来更强化了“影视剧化”的因素，就其质素而言，不能说已经进入了揭示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层面，也不能说已提出重大的时代性精神课题。我们的文学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高超成熟的“政治小说”。